

弁 言

按通行時間的先後，傳世的漢文文獻資料大概可以分爲銘刻、簡帛、寫本、印本這樣四個序列。寫本文獻介於簡帛與印本之間，大約始行於漢代。東晉安帝元興元年（402），官方下令“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從此紙張取代其他文字載體，成爲主要的書寫材料，於是書籍的流傳從簡帛時期邁向紙寫本時期，并一直行用到晚唐五代，其主要流通期約爲700年。但宋代以後隨着刻本的流行，文獻的傳播進入印刷時代，寫本書籍就幾乎全被廢棄了。我國傳世的古書，主要是以宋以後刻本的面貌呈現的，所以以前人們談論古籍，主要依靠刻本，而尤以宋版元版爲珍貴。而刻本之前寫本的情況如何，則往往不甚了然。

清末以來，寫本文獻大發現，包括吐魯番文書、敦煌文獻、黑水城文獻、宋元以來契約文書、明清檔案，等等，數量巨大，震動世界，寫本文獻才又重新回到世人的視域之中。尤其是清末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敦煌文獻，數量之多，價值之高，影響之大，都是空前的，更爲人們認識寫本文獻、了解寫本文獻、研究寫本文獻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敦煌文獻發現不久，就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形成了一個世界性的研究熱潮。特別是日本學者，憑藉他們良好的漢語基礎，以及獲取資料的方便，在敦煌學的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績，出現了一代又一代叱吒世界學壇的敦煌學家，比如我所仰望的藤枝晃、入矢義高、池田溫等前輩學者。這裏我想特別表示一下對與我的研究旨趣近似而又爲我長期以來所崇拜的高田時雄先生的敬意。

高田時雄先生是世界著名的的東方學家、敦煌學家，1980年獲得法國哲學博士，2005年又獲京都大學文學博士，現爲京都大學榮譽教授、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他長期致力於敦煌吐魯番寫本文獻尤其是其中的胡語文獻的研究。如眾所知，敦煌是唐代前後的一座國際城市，不但是古代絲綢之路上著名的東西方貿易中心，也是世界四大文明的唯一交匯之地，六萬多件敦煌文獻就是這一交匯的實物見證，其中固然以漢語寫本文獻爲主體，但也有數量眾多的西域乃至國外語言寫本文獻，如粟特語、于闐語、回鶻語、梵語、希伯來語以及胡語與漢語雙語文獻，等等，豐富多彩。由於種種原因，中國學者很少涉足後一領域。高田先生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赴巴黎留學，遍訪歐美，得名師親授，并憑藉其深厚的漢語根底和卓越的語言天賦，攻克并掌握了中古時期的各種西域語言。在此基礎上，他對敦煌文獻中的漢藏對音資料、回

鶻文書資料、于闐文書資料等做了系統全面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進行了類似破譯密碼的艱苦探索，糾正了前此不少不正確或片面的意見，初步勾勒出了敦煌地區九、十世紀河西方言的面貌，描寫了當時漢語與胡語接觸、交流、滲透與融合的實況，提出了許多帶有顛覆性和創新性的新觀點、新結論，得到了海內外學術界的廣泛讚譽。與此同時，高田先生還對許多敦煌吐魯番寫本文獻進行了整理、討論和研究，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果，極大促進了寫本學的研究。另外，高田先生還擔任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幹事長，對世界各國敦煌學研究的開展與協調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特別令人感佩的是，從上个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高田先生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組織主持了共同研究班，包括“西陲發現中國中世寫本研究班”，匯集關西一帶的研究骨干、博士、碩士及訪問學者，就漢語音韻史、與近代歐洲的語言接觸、與中亞的文化交流、敦煌學和寫本研究等課題進行會讀研討，其成果匯編為《中國語史の資料と方法》《明清時代の音韻學》等研究報告，并以《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的形式逐年出版（現已出版 12 號），將有關敦煌學和寫本學的共同研究最新成果刊行於世，吸引了國內外的高度關注，尤其是在青年人才的培養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現在馬上要出版的《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 13 號，作為高田先生古稀紀念特刊，是在 2018 年 9 月 15-17 日浙江大學召開“中日敦煌寫本文獻學術研討會”提交的論文的基礎上編纂而成的，因為這一機緣，負責本期編輯的山本孝子博士要我代表浙江大學在前面寫幾句話，因就寫本文獻與敦煌學的發端，高田先生在其中的傑出貢獻，談一點感想，并以此表達我對高田先生的崇仰之情和最美好的祝願。

浙江大學 張涌泉

2019 年 1 月 6 日